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

——日伪东亚联盟运动之兴亡

“同文同种”的骗局

史桂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同文同种”的骗局

——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



著 者：史桂芳

责任编辑：陈文桂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838-0/K·120

定价：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

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9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前 言

东亚联盟论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炮制的侵略理论，它以石原构想的日美“最终战争”为前提，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鼓吹首先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防卫体制，实现日本对东亚各国的控制，进而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在日本侵华战争呈现长期化的形势下，东亚联盟论者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对华新政策，极力主张分化国民政府，扶持汪伪政权，企图通过政治诱降和欺骗手段，达到军事侵略难以达到的目的。

东亚联盟论者还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域，成立了多个东亚联盟协会，并掀起了颇具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1942年2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任会长。日本和中国伪政权控制地区的东亚联盟协会，都发行《东亚联盟》杂志，宣扬东亚联盟的理论，以配合日本政府及汪伪政权在沦陷区的统治。汪精卫还以东亚联盟论曲解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将其作为伪国民政府建立的理论依据，以掩饰其傀儡政权的性质。

东亚联盟论作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与日本的侵华政策、步骤和战略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东亚联盟运动则直接配合了

日本政府侵略政策，适应了汪精卫伪政权在思想上控制沦陷区人民、破坏中国抗战的需要。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和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东亚联盟论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各种亚洲观中，惟一直接将侵略理论化作国民运动的。东亚联盟论和东亚联盟运动，是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日本史学界很重视对东亚联盟理论和运动的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日本出版了大量涉及东亚联盟理论、运动、人物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藤本治毅《石原莞尔》（时事通信社，1964 年第一版，1995 年再版）、山口重次《满洲国建国的历史——满洲国协和会史》（荣光出版社，1973）、高木清寿《东亚之父——石原莞尔》（东京，たまいらぼ社，1985）、仲条立一《石原莞尔的一切》（新人物往来社，1989）、野村乙二郎《石原莞尔——军事思想的功罪》（同成社，1992）、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群像》（校仓书房，1984）、古屋哲夫《日中战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松泽哲成《日本法西斯的对外侵略》（三一书房，1983）、秦郁彦《军之法西斯运动史》（原书房，1973）等等，研究论文就更多了。

除此之外，还出版了大量有关东亚联盟的回忆录、资料集。20 世纪 90 年代初，又将日文《东亚联盟》杂志全部影印，分 19 册出版，著名的东亚联盟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的小林英夫教授还为这套资料写了专论，以便研究者使用。日本学者研究东亚联盟论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探讨东亚联盟论产生的原因。日本学者认为东亚联盟论源于石原莞尔对宗教的信仰和他提出的“世界最终战争论”。石原莞尔 1921 年即参加“国柱会”，开始信仰日莲宗。日莲宗是佛教的一个流派，“国柱会”即信仰日莲宗，它于 20 世纪初在日本建立。“国柱会”不仅是一个

宗教团体，而且经常发表政论。1923年“国柱会”的创建者“田中智学在《天业民报》上发表《啊，太平洋》一文，预想将来日美发生对立”^①。石原莞尔借助所谓日莲圣人的预言，提出了“世界最终战争论”。他认为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和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将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决定人类的最后命运。以日本为首的东方文明，要取得最终战争的胜利，就要与亚洲邻国结成联盟。也就是说，结成东亚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日本对世界的最终统治权。

日本学者也指出了东亚联盟论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世界最终战争论以及东亚联盟论与日本近代社会发展、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西乡隆盛、大川周明等都对石原莞尔产生过深刻影响。石原莞尔生活在日本法西斯势力膨胀时代，加之从小就在军校上学，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经常考虑“小国”日本与亚洲各国提携，具有与德国等“大国”匹敌的力量，并战胜他们”^②。石原莞尔对中国人民有一种蔑视心理，很早就有侵略、占领中国的欲望。

第二，关于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和性质。有的学者认为东亚联盟与日本的侵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它“首先是作为具体的大陆政策设想提出来的”^③，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侵略理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侵略政策。东亚联盟是以帝国主义为基础的，只不过

① 松泽哲成：《石原莞尔と最终战争论（二）》，载〔日〕《社会科学研究》第22卷第4号，第59页。

② 松泽哲成：《石原莞尔と最终战争论（一）》，载〔日〕《社会科学研究》，第22卷第3号，第142页。

③ 桂川光正：《东亚联盟运动史小论》，载古屋哲夫编《日中战争史研究》，第365页，吉川弘文馆，1984。

是在表面上稍微放弃了一些帝国主义的统治；它与直接的武力侵略，即粗暴的、愚蠢的帝国主义的区别，只在于它是主张取得对方谅解进行统治的贤明的帝国主义。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无论是“粗暴的、愚蠢的”，还是所谓“贤明”的，都是帝国主义的。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东亚联盟有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一面，但是，在具体论述东亚联盟时，又为其表面的“政治独立”所迷惑，认为东亚联盟论有反省日本帝国主义政策、自我抑制日本国家主义的一面。也有人认为东亚联盟论有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方面，汪精卫在中国大陆开展东亚联盟运动，证明了东亚联盟论有正确的内容。其实，东亚联盟论尽管在表面上声称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实际上不过是企图用诱骗的方法，瓦解中国的抗日营垒，达到军事进攻难以达到的目的，这与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站在歌颂东亚联盟的立场上，认为东亚联盟“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信念在努力”^①，认为石原莞尔策划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都是为了建立东亚联盟以实现人类绝对和平的理想。还有的学者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区域合作不断加强，东盟建立、欧洲一体化等，说明东亚联盟理论的正确性，认为东亚联盟就是欧盟等思想的先驱。这种不顾历史条件、合作内容等不同，将东亚联盟简单地与当今世界上各国的合作及同盟相提并论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关于东亚联盟与日本侵略政策的关系。石原莞尔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他炮制东亚联盟论与日本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寻找出路、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不谋而合。九一八事变

① 武田邦太郎：《信仰者石原莞尔と东亚联盟运动》，载仲条立一、菅原一彪编《石原莞尔のすべて》，第69页，人物往来社，1989。

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成立了伪组织协和会，东亚联盟论的鼓吹者把在东北实现“民族协和”、“王道主义”作为东亚联盟的基础。日本有的学者认为东亚联盟理想是从“满洲国”建立时产生的，伪满洲国“以民族协和的新方式建设国家，以应付将来世界形势之变化”^①，从而肯定东亚联盟论及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动。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破产，不得不调整侵华政策。1938年12月，日本发表了对华三原则。东亚联盟论认为近卫三原则与东亚联盟的主张基本一致，“东亚联盟成了说明‘新秩序’内容的理论，得到社会舆论一定程度的接受”^②，鼓吹按照东亚联盟的主张，结束中日战争。东亚联盟论与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八卷佳子还对伪政权统治区的东亚联盟运动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当然，也有日本学者以汪精卫集团统治地区的东亚联盟运动，说明东亚联盟论的正确。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还对与东亚联盟论关系密切的有关人物和东北协和会、新民会之类的伪组织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日本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是，从总体上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是对东亚联盟论本质的分析比较模糊，即使承认东亚联盟论是侵略理论的学者，也强调它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与一般侵略理论不同，具有批判帝国主义的色彩，有的学者甚至完全肯定东亚联盟论，认为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其次，有的学者因为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有矛盾，而肯定石原莞尔，从而肯定东

① 藤本治毅：《石原莞尔》，第110页，时事通讯社，1995。

② 前引桂川文，第379页。

亚联盟论。笔者认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但是，它不是侵略与不侵略中国的问题，而是以何种方式实现日本侵略目标的问题，其本质是一样的。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有责任对东亚联盟论以及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回答日本学者提出的问题，弄清历史之是非曲直。目前中国学者对日本侵略理论的研究，较之对日本侵略政策、罪行等方面的研究，显得薄弱。对中日战争时期的侵略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东亚共荣圈论问题，而对东亚联盟论的研究，只有几篇论文^①，尚无研究专著问世，这与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总体研究进程极不相称。因此，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东亚联盟论以及东亚联盟运动进行系统的剖析，指出东亚联盟与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观的关系，深入分析东亚联盟论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及中国伪政权控制地区的状况，从而认识东亚联盟论和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本质。这对于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原因，反对日本少数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历史翻案，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果本书能对深化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本人将备感荣幸。

①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陈戎杰《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第一章 近代日本亚洲观的形成与演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其国内有各种各样的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与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观之间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东亚联盟论的产生自然也是近代日本亚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要探究东亚联盟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就须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各种亚洲观做一番考察。

一 “锁国”体制的形成与崩溃

（一）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

马克思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不断拓展市场，早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的16世纪，西方列强就纷纷来到远东，进行殖民和商业活动，企图在古老的东方建立起殖民经济体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先后来到日本，在日本各地推销商品，开辟外国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

“居留地”，享受治外法权，并传播天主教等西方的宗教思想和价值观念。西方列强势力东渐，强烈冲击着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幕府统治，随着西方各国贸易的增加，外国传教士的不断涌入，德川幕府（1603～1867）深感西方列强对封建经济和幕府统治的严重威胁，于是决定断绝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1632～1639年，德川幕府先后发布五道锁国令，1639年最终完成了“锁国体制”。此后日本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①时期。

日本实行“锁国”是出于维护封建经济、政治的目的。因为当时西南部沿海的一些封建领主，通过海外贸易增强了经济实力，并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军事力量不断强大，成为幕府的潜在威胁。日本人民在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中，了解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知识，基督教宣传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又是与封建专制统治、等级制度相对立的。正是因为这样，幕府发布“锁国”令，严格限制日本人民与外国人的接触，禁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取缔西方国家与日本的贸易。当然幕末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从主观上讲，也有防范西方资本主义侵略、避免主权受到危害的意图。在实行“锁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各国对日贸易确实有所减少，基督教教徒遭到迫害，这似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锁国”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对外政策，它只能延缓民族危机的来临，并不能根本解决危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锁国”导致更严重的民族危机。

① 锁国：完全断绝日本与海外的交流，或把它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在锁国体制下，外国人当然不许进入日本，日本人也不许到海外。日本与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明显制约。荷兰是新教国家，不在日本传教，与日本有少量贸易往来。中国、朝鲜是日本的近邻，日本可以在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中得到好处，幕府的统治不会受到威胁，在“锁国”体制下，日本只与中国、朝鲜和荷兰有少许贸易往来。

（二）“锁国”体制面临危机

在日本实行锁国的第二年，即 1640 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影响了整个世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8 世纪相继发生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了统治地位。18 世纪中叶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更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飞速发展，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向世人展示着它那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日本的“锁国”自然难以抵御资本主义的入侵。“锁国”政策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人为地将日本与世界隔绝开来，阻碍了日本与世界的交流，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也影响了日本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推迟了社会的进步，使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面临着更严重的民族危机。

中国也曾实行过与日本类似的闭关自守政策。清政府 1672 年发布“海禁”令，后虽解除禁令，但是对与外国贸易实行严格的控制。清政府希望通过闭关政策，割断中国人民与外界的交流渠道，巩固其封建统治，同时也期望闭关自守能防止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与骚扰。然而，闭关自守的政策终难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1840 年开始的鸦片战争，英国用洋枪洋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划上了一个句号，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世纪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

鸦片战争不仅给中国社会以巨大的影响，也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知“中国被打败”，从幕府、大名到一般藩士、商人、大地主都受到强烈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从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开始思考实行“锁国”的日本的命运，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日本很多人认为中国被英国打败，实在出人意

料，老大中国都被打败，更何况区区之日本。幕末重臣、明治初年任海军大臣的胜海舟在《中国骚乱之概况》一书的按语中指出：“邻国之事也是我国之鉴。欧洲的势焰渐入东洋，有剥体以肤之诚。识者寒心，岂其梗概”^①，总理幕府政务的老中（幕府最高级执政官）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②，日本人认为应以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为鉴，吸取教训，避免重蹈中国之覆辙。

正如日本有识之士所担心的，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侵略势力开始染指日本。1845年英国人数次来到日本，要求通商。1845年法国舰队司令塞西尔少将率军舰到日本，要求布教和通商。1844年7月，荷兰海军上校科普斯率舰队到日本的长崎，带来荷兰国王威廉二世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威胁日本如不开国，将重蹈中国的覆辙。幕府深感外国势力难以对付，为避免与外国势力直接冲突，维护幕府的反动统治，幕府对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进行了一些修改，规定对漂流到日本的外国船只可以供应水、粮食，使其离开，同时，拒绝了西方各国对日本的开国要求。

（三）“黑船”来航，迫使日本打开国门

19世纪中叶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美国为了向亚洲发展，要求日本开国。1852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准将培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委以实现日本开国的重任。1853年7

① 胜海舟：《海舟全集》第2卷（上），第43页。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② 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第292～293页。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37页。

月，培里率舰队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日本开放港口，并威胁此行若不能解决问题，来年春天将率领更大规模的舰队前来，不惜使用武力。因为培里率领的四艘军舰都是黑色的，所以培里之行在日本被称为“黑船事件”。幕府被美国的威胁吓破了胆，在第二年的3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开放下田、箱馆两港，允许美国在日本派驻领事，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纷纷效尤，与日本签订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持续了200多年的“锁国”体制被打破，被迫“开国”。

“黑船事件”和日本被迫“开国”，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利，更使他们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威力。他们发现曾视若神明的中国儒学和东方文化，在西方列强面前竟是那样不堪一击，要想免遭殖民地的厄运，必须改变以往的政策，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用之于日本，了解世界的发展大势，改革弊政。日本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从被迫开国的实践中，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威力，这个自古以来就以善于学习他国文明而著称的民族，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选择了学习西方，选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 明治政府的改革政策

（一）废除幕府制，建立明治新政权

日本“开国”后，西方各国依靠其获得的特权，在日本大规模地建立外国人“居留地”，驻扎军队，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日本，日本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陷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外国势力对日本经济的控

制，导致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进一步恶化，下级武士生活艰难，出现了大批失业者，社会矛盾尖锐激化，幕末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开国”也刺激了日本商品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当然，日本的资产阶级在幕末力量比较微弱，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日本被迫“开国”激发了下层武士及下层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民族危机意识，广大人民群众也对幕府的专制统治强烈不满，于是下层武士、资产阶级、部分公卿、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起来，在1868年发生了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的倒幕运动，废除了幕府制，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新政权。

（二）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其目标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明，在日本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国家。明治新政府建立后，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实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明治政府成立后，废藩置县，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废除“秽多”、“非人”等贱民的称呼，允许华士族和平民之间通婚，实行“四民平等”。通过整理俸禄，使武士变成单纯的公债持有者，不再享有特权。这样，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日本消失。明治政府通过《征兵令》，改变了军队全部由武士垄断的状况，建立了近代常备军和近代警察制度。

明治政府进行了土地和地税改革，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新兴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建立了近代土地制度。为了实行“殖产兴业”，明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1871年11月派出规模庞大的使团考察美、英、法、德、俄等十几个国家。通过考察，

日本政府明确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方针。为培养与引进科技人才，明治政府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到日本，很多外国专家的收入超过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的收入。这些外国专家对日本发展近代工业、交通、军事和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待日本培养出自己的高级人才后，逐步将外国专家解雇。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日本政府还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回国后，基本代替了外籍专家的工作。

1880年以后，日本政府廉价“处理”了国营企业，出售价格十分低廉，条件优惠，这些企业基本是通过征收地税、搜刮人民血汗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将其廉价处理给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这些大资本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政商”，是“财阀”的前身。明治政府还通过巨额补贴、进口优先等政策，对私人资本实行扶植和保护方针。在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下，私人资本的力量壮大，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日本形成了近代产业资产阶级。

“文明开化”主要是指学习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广泛流传。明治政府非常重视教育，1872年政府颁布了教育法令——《学制》，确定了日本实行资产阶级国民教育的方向。日本将大量的“寺子屋”改为西式学堂，建立近代学校制度，实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所有这些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

实事求是地说，明治政府“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口号，的确有改变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进步意义，但它同时又是加强天皇制国家机器的重要手段，带有向亚洲邻国侵略扩张的反动的一面，尤其